



西藏研究

TIBETAN STUDIES

(双月刊)

ཏཱིའུ་བོ་ལྷོ་ལྷོ་ལྷོ་ལྷོ་

- 唐蕃清水会盟碑在敦煌石窟中的历史遗迹
——瓜州榆林窟第25窟功德主新解
- 西藏产业结构演变:特征、问题与对策
- 嘉绒藏族村落社会的宗教文化
——以大渡河上游的沈村为例



2015.3

西藏社会科学院主管(办)

目 录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暨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

中国现代藏学的确立与发展

- 写在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之际 阴海燕(1)

国际视角

乌克兰危机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合作领域新发展

- 兼论对“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的影响 罗斌(9)

历史

唐蕃清水会盟碑在敦煌石窟中的历史遗迹

- 瓜州榆林窟第25窟功德主新解 马俊峰 沙武田(15)
《宋史·唃廝囉传》笺证 齐德舜(23)
雪碑最初立碑位置考 江琼·索朗次仁(37)

宗 教

- 香格里拉藏传佛教发展现状考究 闫润清 冯天春(43)
藏传佛教寺院因明学教育制度述略 才让道吉(52)

经 济

- 西藏产业结构演变:特征、问题与对策 王磊 杨明洪(58)
西藏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分析 韩亮(65)

社会学

嘉绒藏族村落社会的宗教文化

——以大渡河上游的沈村为例 郎维伟 周勇军(74)

论民族语言在家庭语域中的使用与传承

——以民族语言衰微地区的调查材料为例 王浩宇(81)

语言学

藏族谚语的语言特色及文化内涵 益西拉姆(90)

建筑

松赞干布时期的拉萨建设初探

——从藏传佛教“建筑场景”类绘画研究出发 李婧(96)

文献学

试论崔克信《盐井之地质及盐业调查》的价值和意义 李何春(103)

教育

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安全风险与防范

——以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索朗欧珠(112)

美术

计美赤来及其绘画作品 次旺扎西(116)

期刊基本参数:CN54-1006/G*1981*B*16*120*zh*P*¥8.00*1700*16*2015-06

本刊通讯地址:拉萨色拉路4号 邮编:850000 电话:0891-6902340

刊名题字:赵朴初

美术设计:本刊编辑部

- 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 中文核心期刊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 全国百家重点社科期刊
- 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
- 人大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 《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期刊

西藏研究

(双月刊,1981年创刊)
2015年第3期总第151期
(2015年6月出版)

TIBETAN STUDIES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1)
No. 3 (Holistic Serial No. 151)
Issued in June 2015

| | | | |
|---------|-----------------------------------|------------------------------|-------------------------------------------------------------------------------------------------------------------|
| 主管(办)单位 | 西藏社会科学院 | Sponsor(Direct Manager): | Tibet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 编辑出版 | 《西藏研究》编辑部 | Editor - Publisher: | Editorial Board of Tibetan Studies |
| 主 编 | 仓决卓玛 | Editor - in - Chief: | CANG Jue Zhuo Ma |
| 副 主 编 | 蓝国华 | Vice - Editor - in - Chief: | LAN Guo Hua |
| 国内发行 | 全国各地邮局 | Domestic Distribution: | Post Offices Across the Country |
| 国外发行 |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5号) | Distribution Abroad: |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Group Company, Ltd. Chengongzhuang West Road No.35,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
| 印刷单位 | 西藏新华印刷厂 | Printer: | Tibet Xinhua Printing House |
| 发 行 | 西藏拉萨市邮局 | Distributor: | Post Office of Lhasa Municipality |
| 编辑部地址 | 西藏拉萨市色拉路4号 | Address of Editorial Office: | Sera Road No. 4, Lhasa, Tibet, China |
| 邮 政 编 码 | 850000 | Post Code: | 850000 |
| 电子信箱 | xzyj1981@sina.com | E-mail: | xzyj1981@sina.com |
| 刊 号 | ISSN1000-0003 CN54-1006/G | Periodical Number: | ISSN1000-0003 CN54-1006/G |
| 邮发代号 | 国内:68-7 国外:Q1075 | Distribution Number: | Domestic:68-7 Abroad:Q1075 |
| 定 价 | 国内:8.00元 国外:8.00美元 | Price: | ¥:8.00 \$:8.00 |

ISSN 1000-0003



9 771000 000086

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历史遗迹

——瓜州榆林窟第25窟功德主新解

马俊锋¹ 沙武田²

(1、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2、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关键词] 榆林窟第25窟;清水会盟;功德主;尚结赞

[摘要] 瓜州榆林窟第25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代表洞窟,在唐蕃艺术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洞窟功德主的考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清水会盟前后唐蕃关系、榆林窟第25窟洞窟形制以及吐蕃式图像出现的相关历史背景,我们初步认为榆林窟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藏文题记中提到的“尚书”或有可能为促成唐蕃“清水会盟”的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尚结赞。榆林窟第25窟实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783年任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而建,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蕃和好的功德,具体建窟时间应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中图分类号] K87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15)03-015-08

前言

关于榆林窟第25窟营建的动机及功德主,学界研究成果颇丰。马修·凯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先生认为榆林窟是821—822年唐蕃为纪念长庆会盟而建的德葛玉采会盟寺(དེ་གཞུ་ཚལ་གཞི་གསུམ་གྱི་གཙུག་ལག་ཁང་),而榆林窟第25窟具有汉藏宗教调和风格,适合作为唐蕃调和的纪念^{[1]98-127}。但经黄维忠先生考订,德葛玉采会盟寺并非榆林窟而是孔古

寺^[2]。虽然为纪念唐蕃长庆会盟而建的德葛玉采会盟寺(དེ་གཞུ་ཚལ་གཞི་གསུམ་གྱི་གཙུག་ལག་ཁང་)与榆林窟第25窟关系不大,但是马修·凯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先生提出榆林窟第25窟具有唐蕃宗教调和风格、唐蕃会盟或唐蕃友好意义的观点值得参考。陆离先生认为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藏文题记中的“གང་ཤེད”只能为“尚书”的翻译,该题记表明榆林窟第25窟是曹姓人士为尚书(吐蕃东道节度使)开凿的功德窟,有可能为长庆会盟后纪念尚乞心儿或尚

[收稿日期] 2014-12-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973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CB725306)、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BKG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3JJD78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俊锋(1988—),甘肃会宁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美术史研究;沙武田(1973—),甘肃会宁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美术史研究。

腊藏促成长庆会盟而为其建造的功德窟,也有可能为长庆会盟前赞颂某位吐蕃东道节度使治理河陇地区的功绩而为其建造的功德窟^[3]。我们也曾经撰文认为该藏文题记中提到的“尚书”为尚乞心儿,榆林窟第25窟为尚乞心儿功德窟,建窟的目的是吐蕃人为了“纪念”对瓜州的占领,又是通过佛教手段向瓜沙地区的汉族人表示友好,该窟实为一具有“纪念碑”式的洞窟^[4]。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诸家之说大同小异,共同传达出榆林窟第25窟具有纪念唐蕃会盟或唐蕃友好意义的信息。如果综合来考虑,榆林窟第25窟既有纪念唐蕃会盟或表达唐蕃友好的意义,又是某位曹姓人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建的功德窟,因此可以说这是个具有双重性质的洞窟,由此引发我们对该窟的营建动机以及功德主等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榆林窟第25窟的思考仍在继续,产生新的想法,对之前研究有所补充与修订的意见,换个视角,或许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同时本着推动学术前进的理念,草成此文,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一、藏文题记“尚书”再辨

榆林窟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中的藏文题记,学界关注较多。首推谢继胜、黄维忠二位先生将该题记提升到洞窟营建时代和造像绘制确凿年代的高度,二位先生将其转写为(//dzevu/devi cung gyis/phags pav khor cig/bgys pav vdi shang shevi/sku yon du/bsngas pav/lags so//, ༡༩། །རྟེན་དེའི་བྱུང་གྱིས་ལགས་པའ་ཁོང་ཅིག་པུ་ལྱིས་པའ་འདི་གང་གི་སྐུ་ཡོན་ཏུ་བཟླས་པའ་ལགས་སྟེ།),释读成汉文为:“曹氏幼弟施画此铺圣图,此乃回向‘尚希’之公德,甚佳!”并指出该题记中“པ་ཤེའི”可能为《拔协》中提到的:“桑喜”或汉字“尚书”的翻译,这位曹姓人士为曹僧政,该窟建造于9世纪上半叶^[5]。陆离先生肯定谢继胜、黄维忠对榆林窟

第25窟建窟时代的判断,但他分析“པ་ཤེའི”只能为汉字“尚书”的翻译,该尚书应为总管吐蕃军政事务的吐蕃东道节度使,也认为榆林窟第25窟是某位曹姓人士(该曹姓人士与曹英子有关)为尚书(吐蕃东道节度使)开凿的功德窟,最后指出该窟壁画最终完成时间是在吐蕃统治河陇地区——有可能为长庆会盟之后(开凿有可能为长庆会盟前),将其用来纪念和赞颂吐蕃大相兼吐蕃东道节度使尚乞心儿或尚腊藏使唐蕃和好的功德;又认为洞窟开凿也可能为822年之前,将其用来纪念和赞颂当时某位吐蕃东道节度使治理河陇地区的功绩^[3]。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谢继胜、黄维忠二位先生认为该藏文题记是先按照榜题框大小写好藏文再画框,所以有个别藏文字母被边框墨线压住,这明显不符合敦煌石窟题记框的题写规则。按照他们的观点,显然认为该题记和壁画是同时期绘制。所以,谢继胜、黄维忠和陆离三位先生推断的榆林25窟建窟时间或许为藏文题记题写时间,而实际建窟年代要比他们断定的时间早。但经过我们现场仔细辨认,该题记明显是先画框而后再题写藏文,有的藏文字母明显在榜题框的边框上面。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该题记是后面补写上去的,带有追记颂扬性质的题记,其题写时间要比壁画绘制时间晚,藏文题记的题写时间并不是开窟绘制壁画的时间。不过现在看来,该藏文题记题写藏文和画题记框的先后顺序,也并不会妨碍我们对建窟时代及功德主的判断。

我们之前撰文认为该藏文题记提到的“尚书”应为尚乞心儿,榆林窟第25窟是建于瓜州陷蕃后,具体应属于“盛唐吐蕃期”的776—786年间^[6],其功德主应属身为瓜州节度使、沙州作战前沿总指挥尚乞心儿的功德窟,并指出该窟实为一具有“纪念碑”式的“秘密性”的“内修”洞窟^[4]。对于之前的研究,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我们注意到榆林窟第25窟为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洞窟,也提及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和平氛围下营建该窟的合

理性,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之前没有把榆林窟第25窟和清水会盟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783年唐蕃清水会盟正是在我们断定的该窟营建于776—786年时间范围内这一重要的历史时间的重合关系及其引发的思考;其次,我们虽然注意到榆林窟第25、15窟吐蕃样式天王造像与清水会盟的关系,及榆林窟第25窟洞窟形制以及八大菩萨曼荼罗与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的关系,但其与尚乞心儿的关系仍需再作考量;再次,我们认为北壁带有追记性质的藏文题记,其题写时间要比壁画绘制时间晚,所以,存在开窟绘制壁画时洞窟功德主为尚书或藏文题记题写时洞窟功德主为尚书两种可能,也就是说,藏文题记题写时,藏文题记中提到的以“尚书”身份担任吐蕃东道节度使的洞窟功德主,他正担任吐蕃东道节度使或担任过吐蕃东道节度使,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是合理的。基于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重新思考,我们发现对榆林窟第25窟营建的时代背景和功德主,或许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以下分别论之。

810年,尚乞心儿作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符合藏文题记题写时的尚书身份,但考虑到洞窟营建的时间关系(776—786年),显然他并不符合开窟建造时的尚书身份。而尚结赞783年作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这个时间正是第25窟的营建年代时间段。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如果洞窟功德主仍健在,这则由其他人题写的属于追记性质的藏文题记赞颂他的可能性较小。而796年尚结赞的去世,则恰为题写藏文题记追记他提供了可能。

当然,正如我们之前的研究一样,这则藏文题记中提到的“尚书”的确有可能为尚乞心儿,该窟也有可能是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尚乞心儿的功德窟。但是,考虑到该窟具有纪念唐蕃清水会盟的背景与意义,而此时,主和派尚结赞^①战胜主战派尚乞心儿担任吐蕃大相,并且主导了清水会盟,显然尚乞心儿与清水会盟关系不大,也就不大可能为藏文题记中提到的“尚书”即榆林窟第25窟的功德主;最

后,榆林窟第25、15窟吐蕃样式的天王像与尚结赞主导的清水会盟有很大关系(详见后文)。榆林窟第25窟洞窟形制以及八大菩萨曼荼罗又受到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影响,而尚结赞作为监工制作桑耶寺图并建造红塔以供养桑耶寺,想必对其建筑形制和图像很熟悉,因此他把如此独特并具有纪念意义的图像运用到自己的功德窟,作为对清水会盟的纪念亦在情理之中。综合考虑,榆林窟第25窟与尚结赞关系很紧密,该窟功德主为尚结赞比尚乞心儿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认为藏文题记中提到的“尚书”有可能为尚结赞。

我们仍然认为榆林窟第25窟营建于776—786年^[6],赞同陆离先生所分析的该藏文题记中的“པ་ཤེན་པོ་”只能为“尚书”的翻译,该尚书应该为总管吐蕃军政事务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该题记是822年前某位曹姓人士为尚书(吐蕃东道节度使)开凿的功德窟,将其用来纪念和赞颂当时某位吐蕃东道节度使治理河陇地区的功绩的观点^[3]。实际上,该窟建造年代比822年早很多,具体而言当是纪念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促成唐蕃清水会盟的功德。在前贤的启发下,经过仔细推敲,我们以为藏文题记中提到的“尚书”应为尚结赞,榆林窟第25窟实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783年任大相兼东道节度使)而建,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蕃和好的功德,具体建窟时间应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二、尚结赞及其主导的清水会盟

尚结赞,全名那囊·尚结赞拉囊,他出身于著名大姓那囊氏家族,而那囊氏、没庐氏、緄氏及大臣贝并称“三尚四论”,并且该家族一直与王室联姻^[7]。据林冠群先生研究,那囊·尚结赞拉囊之名各书记

^① 尚结赞(ལང་རྒྱལ་ལྷན་པོ་)全名为那囊·尚结赞拉囊(ལྷན་པོ་ལང་རྒྱལ་ལྷན་པོ་),本文简称尚结赞。

载不同:敦煌文献大相年表上及捍松德赞兴佛证盟诏敕上所记为 $\text{ལང་ལྷོ་མཚན་ལོ་མོ་$;《大臣遗教》与《大王遗教》所记为 $\text{ལང་ལྷོ་མཚན་ལོ་མོ་$,因此汤玛斯氏据 ལང་ལྷོ་མཚན་ལོ་མོ་ 认为其具有汉人血统;《贤者喜宴》所记为 ལང་ལྷོ་མཚན་ལོ་མོ་ ;《西藏王统记》所记为 ལང་ལྷོ་མཚན་ལོ་མོ་ ;汉文史料所载尚结赞即为 ལང་ལྷོ་མཚན་ལོ་མོ་ 之对音。《贤者喜宴》记载,尚结赞担任监工,为桑耶寺制作桑耶寺图及造红塔以供养桑耶寺,可见其信奉佛教之虔诚。尚结赞在担任大相之前默默无闻,而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在 755—763 年间有一位非常活跃名为 ལང་ལྷོ་མཚན་ལོ་མོ་ (尚东赞) 的人不但主持会盟,而且经常率领军队对唐作战,更为 762 年攻陷长安的四大将领之一, ལང་ལྷོ་མཚན་ལོ་མོ་ 和 ལང་ལྷོ་མཚན་ལོ་མོ་ 可能是他在不同时期具有的称号而已,其本名未改,仍为 ལང་ལྷོ་མཚན་ལོ་མོ་ ^{[8]198-200}。现在看来,尚东赞极有可能为后来出任大相的尚结赞。不过目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尚结赞作为监工制作桑耶寺图并建造红塔以供养桑耶寺,在 799 年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的兴佛证盟诏书上有众相九人,其位居第三,至少在 799 年他已经为大相^[9]。

776 年吐蕃占领瓜州,780 年唐德宗继位后,采取对内镇压藩镇、对外与吐蕃和平外交的措施,意欲改变与吐蕃的敌对状态,而吐蕃也因长期对唐作战,力不从心,尤其大历后期战争接连失利,大有言和之意,于是双方互放俘虏,关系缓和。781 年,双方使臣往来频繁,唐蕃积极谈判,为清水会盟作准备。782 年尚结赞利用赤松德赞的言和之意,战胜主战派尚乞心儿并代替他出任大相。据《旧唐书·崔汉衡传》记载:“时(建中三年,782 年)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以尝覆败于剑南,思刷其耻,不肯约合。其次相尚结赞有才略,因言于赞普,请定界明约以息边人。赞普然之,竟以结赞代替结息为大相,约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10]3502-3503} 因双方在边界及土地归属问题上有争议,最终定于 783 年正月十五在清水会盟。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四年(783 年),正月,诏张镒与尚结赞盟与清水。

将盟,镒与结赞约,各以二千人赴坛所,执兵者半之,列于坛外二百步,散从者半之分立坛下。镒与宾佐齐映、齐抗及会盟官崔汉衡、樊泽、常鲁、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结赞与其本国将相论悉颊藏、论藏热、论利颯、斯官者、论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坛为盟。结赞请出羚羊,镒出犬及羊,乃于坛北刑之,杂血二器而歃盟。盟文还规定了双方的边界问题,唐蕃有兵马处各自守护。”^{[10]5247-5248} 清水会盟仪式举行得很隆重,是唐蕃友好的象征,在此次会盟的祭坛上出现的吐蕃式天王像与榆林窟第 25、15 窟吐蕃式的天王像有很大关系,容后文详论。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为了加强对河陇地区统治,交涉对唐事务,吐蕃设置了东道节度使,其驻地大多设置在距离唐边境较近的河州,权力较大,指挥河陇五节度使,特殊情况下还可以指挥其他诸道节度使。吐蕃诸道节度使,一般会由众相兼任,而吐蕃东道节度,其地位特殊,大多会由吐蕃大相兼任^{[11]150}。尚结赞 782 年作为吐蕃大相,783 年又作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为吐蕃赞普对唐交涉之全权代表,由其执行所有对李唐之重要谈判^{[12]357},并且其胆识过人,善用谋略,担任大相一职,是吐蕃在东部的最高指挥官员,决策了对唐的一系列政策^{[11]150},对促进汉藏友好交往作出了很大贡献。从 780 年到 786 年,唐蕃围绕清水会盟展开了一系列交往,出现了短期的和平,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积极推动了唐蕃关系的改善,在他主导下唐蕃先后进行了 783 年清水会盟(后又在长安和逻些会盟确定会盟的合法性)和奉天会盟。尚结赞还出兵助唐平定 784 年的朱泚叛乱,唐德宗答应以安西、北庭等地作为吐蕃助唐平定朱泚之乱的回报,但承诺并没有兑现,双方关系再次恶化。

从影响来看,唐蕃从神龙盟誓(706 年)到长庆会盟(821—822 年)数十次会盟中,规格礼仪最高、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清水会盟和长庆会

盟^{[12]357}。但从实质内容来讲,清水会盟是这十次会盟中最重要的会盟。从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君臣商议会盟到建中四年(783年)春正式盟于清水,而后双方又分别在长安西郊和逻些再次定盟,前后历时四年。清水会盟是唐蕃十次会盟中唯一举行告庙仪式的会盟,足见其庄严郑重。唐蕃十次会盟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达成,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划定双方边界。783年的唐蕃清水会盟是唐蕃之间唯一一次最清楚地划定各段边界的会盟,821—822年的长庆会盟亦是以清水会盟划定的边界为准,直到842年吐蕃地方政权崩溃,双方边界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长庆会盟划定的边界是以清水会盟为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清水会盟的成果,长庆会盟也就不可能很快顺利达成甥舅和盟^[13]。清水会盟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吐蕃自占领瓜州(776年)以来,双方紧张的关系得到改善,使沙州危机得到暂时缓解,延缓了沙州陷蕃时间(786年)^①,唐朝才得以孤守沙州十年^[9]。清水会盟前后双方保持了六年的和平,并且清水会盟为长庆会盟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唐蕃都在大力发展佛教,在处理唐蕃关系时,共同的佛教信仰起着重要作用。双方会盟时往往会选择在寺庙举行,并且有建寺纪念的传统。此外,吐蕃东道节度使也会循例来河陇地区的瓜州榆林窟礼佛及处理政务,由他出资布施,当地僧俗人士为其修建功德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3]。既然榆林窟第25窟藏文题记中提到的“尚书”为尚结赞,汉藏又有会盟建寺纪念的传统,那么作为促成清水会盟的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必然会得到包括瓜沙等地在内的藏汉人民的颂扬,为了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的功德,建造榆林窟第25、15窟作为其功德窟,亦在情理之中。

三、榆林窟第25、15窟吐蕃样式的天王像与清水会盟

榆林窟第25窟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

的毗沙门天王像和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画在北方天王位置并履行传统北方天王职能的吐蕃库藏神造像,实为清水会盟前后尚结赞或洞窟设计者将其运用到洞窟中的结果。榆林窟第25、15窟为同时营建,具有汉式和吐蕃式特征的双窟,共同表达独特的“纪念”意义^[4]。据《寺塔记》记载:“静域寺,佛殿内,西座番神甚古质,贞元已前西番两度盟,皆载此神立于坛而誓,相传当时颇有灵。”^[14]谢继胜先生认为此处贞元以前(785—804年)两度盟的“番神”为吐蕃毗沙门天王像,而且是像榆林窟第15窟库藏神形象者。“西番两度盟”是指唐蕃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赤岭会盟和建中四年(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吐蕃将赞普比作毗沙门天王,故唐蕃会盟时天王作为吐蕃神立于祭坛。因清水处于长安正西,丝绸之路主道,而净域寺是唐京城名寺,所以唐蕃783年清水会盟后将吐蕃式的毗沙门天王像留到净域寺合情合理^[15]。我们亦认为榆林窟第15窟完全吐蕃特色的库藏神以及榆林窟第25窟吐蕃武士装样式的毗沙门天王像的出现与783年清水会盟有关^[4]。陆离先生认为,敦煌石窟中着虎皮衣式的神祇和武士形象与吐蕃军队武士着装、吐蕃民族的虎崇拜以及吐蕃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占领河陇后,将大虫皮制度带入这一地区。陆离先生结合相关背景推断,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吐蕃式库藏神造像中身着完整虎皮的力士大致绘制于779—836年或者842—848年^[16]。显然榆林窟第25窟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的毗沙门天王造像中着虎皮帽者也受到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清水会盟出现的吐蕃式毗沙门天王像以及我们对榆林窟第25窟营建于776—786年^[6]的判断,我

① 关于沙州陷蕃的时间,主要有建中二年(781年)和贞元二年(786年)两种意见。本文取学界广泛流行的贞元二年(786年)之说,详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7页;邓文宽:《三篇敦煌逸真赞研究——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1—87页。

们进一步认为,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画在北方天王位置并履行传统北方天王职能的吐蕃库藏神造像以及榆林窟第25窟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的毗沙门天王像应绘制在783年清水会盟前后。

作为纪念和赞颂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得唐蕃和好而建的榆林窟第25、15窟,其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的毗沙门天王像以及前室北壁画在北方天王位置并履行传统北方天王职能的吐蕃库藏神造像显然与783年清水会盟有很大关系,吐蕃特色的毗沙门天王像出现在清水会盟的祭坛上,继而出现在为纪念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榆林窟第25、15窟中,显得合情合理,正是唐蕃清水会盟历史的反映。

四、榆林窟第25窟洞窟形制及八大菩萨曼荼罗

八大菩萨曼荼罗首次出现在敦煌石窟榆林窟第25窟以及该窟独特形制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与洞窟功能以及洞窟功德主尚结赞有密切关系。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样式来自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桑耶寺是赤松德赞(742—797年)成年后,为抑制苯教,大力引进和发展佛教,于779年在印度莲花生和寂护等人主持下,以古印度波罗王朝时期在摩揭陀国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密宗曼荼罗结构形式)为蓝本建成的^[17],而尚结赞、达札路恭等几个重臣作为监工分别建造红塔和黑塔以供养桑耶寺。赤松德赞两次颁布兴佛诏书,并选拔七名吐蕃贵族子弟,出家为僧,是为“七试人”,产生了首批吐蕃僧人,建立了自己的僧伽组织,桑耶寺也成为佛、法、僧齐全的真正佛教寺院^{[11]175—177[12]267—268}。榆林窟第25窟洞窟形制、中心佛坛窟形以及洞窟表现出的内修和秘密性等特点,作为一类全新洞窟形制出现在敦煌石窟中,明显受到了以桑耶寺、及其后大昭寺、小昭寺为代表的吐蕃中心地区建筑形制的影响^[4]。我们从陈粟裕先生的研究可知,桑耶寺三层

正殿从上到下存在着吐蕃、汉、印三种样式的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虽没有限定造像样式,但毗卢遮那与观音、弥勒、虚空藏、普贤、金刚手、文殊、除盖障、地藏八菩萨的组合是固定的,表现出吐蕃对此图像的重视。陈粟裕先生还发现益西央804年开凿的西藏昌都仁达摩崖和806年建造的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由于益西央本人属于莲花生一系,这两处一佛八菩萨造像可能受到来自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的影响,反映了吐蕃社会对一佛八菩萨的信仰和崇拜以及该题材在吐蕃的流行,通过比较他认为榆林窟25窟采用的图本与仁达摩崖近似^[18]。而我们知道,榆林窟第25窟作为尚结赞的功德窟,建于783年清水会盟前后,要比仁达摩崖要早很多。另外,据田中公明先生研究,最早在桑耶寺创建时,吐蕃就出现了胎藏大日八大菩萨^[19]。所以我们认为榆林窟第25窟的八大菩萨曼荼罗所采用的图本来自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比较纯正和浓郁的印度波罗艺术风格样式^[20]。

榆林窟第25窟洞窟中心佛坛窟形以及八大菩萨曼荼罗,明显受到了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的影响。而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作为监工,制作桑耶寺图并建造红塔以供养桑耶寺,参与了桑耶寺建成的兴佛证盟,想必对其仪式、义理、仪轨以及以桑耶寺为代表的吐蕃中心地区佛教建筑形制及其图像很熟悉,因此他把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流行的中心佛坛窟形以及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用到自己的功德窟中,作为对唐蕃清水会盟的纪念。由于尚结赞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身份,在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影响下,川青藏交界地区出现了大量八大菩萨曼荼罗造像遗迹^{[21][22]}。此外,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唐蕃婚嫁”图,现在看来,其出现在具有纪念和赞颂尚结赞促成清水会盟而建的功德窟中,意义也非常明确,汉藏本来就有联姻,有甥舅关系,其反映的是汉藏联姻、汉藏友好的历史,是对清水会盟很好的纪念。

结 语

榆林窟第25窟,具有明显的汉藏结合特色。榆林窟第25窟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的毗沙门天王像以及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画在北方天王位置并履行传统北方天王职能的吐蕃库藏神造像,是在清水会盟前后将其运用到这两个洞窟中的结果。榆林窟第25窟洞窟形制以及八大菩萨曼荼罗的出现受到来自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该题材流行的影响,其出现在榆林窟第25窟是作为监工制作桑耶寺图并建造红塔以供养桑耶寺的洞窟功德主——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的选择,是对汉藏清水会盟很好的纪念。北壁弥勒经变唐蕃婚嫁图的出现,反映的是唐蕃友好和唐蕃会盟的历史,其出现在纪念和赞颂尚结赞促成清水会盟的功德窟中再合适不过。榆林窟第25窟实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783年任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而建,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蕃和好的功德,具体建窟时间应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榆林窟第25窟不仅仅是尚结赞的功德窟,具有纪念唐蕃清水会盟的意义,是对马休·凯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先生提出该窟具有汉藏调和风格,适合作为唐蕃之间调和的一个合适纪念,具有唐蕃会盟、唐蕃友好意义^{[1]98-127}观点的有力支持,也是对我们之前提出榆林窟第25窟建于776—786年,为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的“秘密性”的“内修”洞窟^{[4]276-297}观点的进一步说明。榆林窟第25、15窟是同时营建的双窟^{[4]276-297},其功德主为尚结赞,其作为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遗迹,将会成为汉藏历史上永远的“纪念碑”。

[参考文献]

[1] 马修·凯普斯坦. De-ga-g-yu-tshal(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与图像[C]//霍巍,李永宪.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

版社,2004.

- [2] 黄维忠. 德葛玉采会盟寺(de ga g·yu tahal gtsigs kyi gtsug lag khang)考——再论该寺非榆林窟[J]. 敦煌研究,2009(3):93—99.
- [3] 陆离. 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的两个问题[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4—57.
- [4] 沙武田. 一座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洞窟——榆林窟第25窟营建的动机、思想及功德主试析[J]. 西部考古: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276—297.
- [5] 谢继胜,黄维忠. 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J]. 文物,2007(4):70—78.
- [6] 沙武田. 关于榆林窟第25窟营建时代的几个问题[J]. 藏学学刊第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12):79—104.
- [7] 石羊. 尚结赞与吐蕃边界之争[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4).
- [8] 林冠群. 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 [9] 陈国灿.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J]. 敦煌学辑刊,1985(1):1—7.
- [10] 刘昉,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 才让. 吐蕃史稿[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 [12] 石硕. 吐蕃政教关系史[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13] 陈楠. 藏史丛考[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 [14] 段成式. 寺塔记[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23—24.
- [15] 谢继胜. 榆林窟15窟天王像与吐蕃天王图像演变分析[J]. 装饰,2008(6):54—59.
- [16] 陆离.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J]. 敦煌学辑刊,2005(3):110—120.
- [17] 王森.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9.
- [18] 陈粟裕. 榆林25窟—佛八菩萨图研究[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3):56—82.
- [19] 田中公明. 敦煌出土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像[J]. 刘永增

- 译. 敦煌研究, 2010(5): 67.
- [20] 张亚莎. 印度·卫藏·敦煌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论[J]. 敦煌研究, 2002(3): 2.
- [21] 谢继胜. 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J]. 中国藏学, 2009(1): 129.
- [22] 霍巍. 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J]. 考古学报, 2011(3): 353—384.

Historical Traces of the Qingshui Treaty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Tibetan Regimes Found in Dunhuang Cav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Owner of Yulin Cave 25

Ma Junfeng¹ Sha wutian²

(1、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2、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Keywords: Yulin Cave No. 25; Qingshui Treaty; The Cave Owner; Shang Jiezan

Abstract: Yulin Cave No. 25 is a representative cave during the time when Dunhuang was ruled by the Tibetan play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art exchange history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Tibe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wner of Yulin Cave No. 25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in academia. Based on previous scholarship,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and Tibetan for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gshui Treaty, and a close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of Yulin Cave No. 25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for the appearance of Tibetan style images, as a investigation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preliminari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ibetan inscription “Shangshu” found on the Maitreya Sutra painting in Cave No. 25 should refer to “Shang Jiezan”. Yulin Cave No. 25 was constructed by a certain member of the Cao family for Shang Jiezan who was appointed as the prime minister and regional commander of the Tibetan East Path. It was built to commemorate and praise Shang Jiezan’s success in enabling the Qingshui Treaty to take place, which greatly impro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and Tibetan regimes. The tim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ave No. 25 should be a few years before or after the Qingshui Treaty, which took place in 783AD.

[责任编辑: 仓决卓玛]

[责任校对: 刘红娟]